

## 协同治理的精神：技术、伦理与民主

[法]西尔万·拉维勒

成昌伟 译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

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

哲学家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在他们创作于二战后的著作——《理性的辩证》中致力于对技术合理性进行严厉的批判。他们认为，机械的合理性只追求效率，丧失了道德的约束，从而完全失去了理性。他们的这种哲学判断或许并不缺乏现实性，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这种经济全球化可以被认为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战争的继续。在权利和胜利的辩解书中，甚至在词汇上，商业精神和战争精神的融合达到了顶峰。从此以后，工业、商业和企业交际中使用甚至滥用这些军事词汇(战役，霸权，消息，目标，战术，战略……)：在这些领域，商品、消息和市场份额成了战斗的武器。

“技术”，不管是设计领域、生产领域或者是交际领域的，都是为了提供有效的方式来最好地实现目标，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和梦想。技术和科学的联合被称之为“工艺”或者“科技”。这种联合不仅仅可以实现建立在信仰和传统用途上的行为，还可以使建立在纯理论的认知上的行为成为现实。但是，人们同时也注意到技术具有伦理双重性：科技可以使人类登上月球或者制造炸弹；科技可以治愈鼠疫或者注册专利；科技可以满足需求或者创造需求；科技可以解放人类或

者控制劳动者和消费者。

“伦理”，作为一种对人类行为的象征意义、辩解和后果的评判的思考方式，在技术的双重性的环境下，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挑战。当今世界，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不断的创新，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存在方式，首先是人们的工作，还有人们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和文化理念。“伦理”作为一种人们思考和行为的标准，非常有效地补充了法律(法令，规定……)和道德(价值观，义务，传统……)，而法律和道德常常因为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扩大而被忽略。伦理过去通常被指责为过于理想化或者无能，而现在却成为一种必需的调节手段来使我们重新找到我们做和说的意义。“我们应该强制性地发展这种技术，重新占领市场，提高利润，推动增长……”但是，事实上，为什么是“应该”呢？目的又是什么呢？而代价又是如何呢？这些有些干扰性的问题就是伦理对于机械性和战略性的行为的质疑(哈贝马斯, Habermas),这种机械性和战略性的行为造就了结合了科学、工业、商业和企业交流的一种联合体——SICC系统(SICC为科学、工业、商业和企业交流四个单词的首字母)。

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的不多的经验之一就是方法和方式有效性的飞速发展，并不是一定同时具有好的价值和目标。根据一个关于世界和生活的科学的概念，只有科学和技术有可能满足合理性的要求，因此相比较而言，道德似乎来源于简单和单纯的不合理性。此外，在政治领域，把思考和决定的权力交给专家和代表中的杰出人士是合理的，因为事实上，普通的人民不够专业，没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提出公正合理的意见。

当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一些可怕的伦理性问题出现了(流产和避孕，克隆动物和人类，同时个体机密数据的信息化，环境中转基因生物的播种，核电站高辐射物质的长期管理，以及最近，为了生育胎儿而制造人造子宫……)同样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同时也是人民，需要直接或者间接地承受着在他们的存在环境中进行社会科技选择的后果。这样，就产生了真正的“合理性的冲突”(例如在科学技术的观点和道德观点之间)，这些冲突常常在局部的和全面的争论中被夸大了。

协同治理的发展前景，趋向于取代传统的政府执政方式，以解决合理性的矛盾，并且发展人民参与的方式。其中一种方法便是发展公众讨论的空间，“综合论